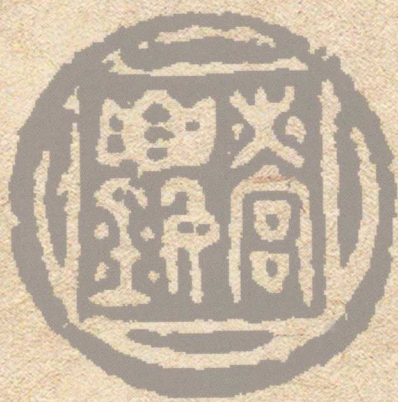


陳光田◎著

戰國簡印分域研究



岳麓書社

陳光田◎著

戰國兩印分域研究



岳麓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戰國璽印分域研究/陳光田著. —長沙:岳麓書社,
2008

ISBN 978-7-80761-070-0

I. 戰... II. 陳... III. 古印(考古)—研究—

中國—戰國時代 IV. K877.6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64458 號

戰國璽印分域研究

作 者:陳光田

責任編輯:管巧靈 王文西

責任校對:舒 舍

封面設計:劉 峰

岳麓書社出版發行

地址:湖南省長沙市愛民路 47 號

電話:0731—8885616(郵購)

郵編:410006

網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26.75

字數:400 千字

ISBN 978-7-80761-070-0/K·267

定價:120.00 元

承印:長沙瑞和印務有限公司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印務部聯繫

電話:0731—8884129

凡 例

一、行文中按照官璽、私璽的順序，把齊系、燕系、楚系、晉系和秦系的有關璽印進行比排和整理。

二、行文中凡是引自《古璽彙編》的有關璽印圖片，一律只注明編號。引自其它印譜的，行文中使用簡稱，後面的數字為該印譜的編號或頁碼，書後有引用印譜簡稱對照。

三、引自學術文章或考古發掘簡報的印章，一般在行文中直接注明。

四、所引用的古代文獻典籍，一般直接在行文中注明，後面的參考文獻不再標出。

五、行文中引用前輩學者的學術觀點時，凡是比較集中的沒有一一作注。如吳振武先生的《古璽彙編》釋文訂補及分類脩訂。

六、秦印部分把過去有爭議，少數被認為是漢初時期的印章也收錄其中，目的是為學術界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參考資料。

七、行文中引用前人的學術觀點時，為了行文便利，對前輩學者一般直呼其名，絕非有不敬之心。



目 錄

凡 例	001
緒 論	001
第一節 戰國璽印研究概述	001
一、古璽印名稱的確定與相關的著錄印譜	002
二、關於古璽印的理論研究	004
三、關於古璽印的文字考釋及分域研究	005
第二節 戰國璽印分域研究的價值和研究方法	012
一、分域研究的價值	012
二、研究方法	013
 第一章 戰國璽印的地域特點與分域標準	015
第一節 璽印文字風格的差異	016
第二節 各地區對璽印稱謂以及官名的不同	018
第三節 印面形制、規格的不同	019
第四節 參考封泥、陶文等考古資料	022
第五節 古璽印的鈕制和印臺的厚薄	023
 第二章 齊系古璽	033
第一節 官 璽	034
第二節 私 璽	052
 第三章 燕系古璽	083
第一節 官 璽	084
第二節 私 璽	097





第四章 楚系古璽	129
第一節 官 璽	130
第二節 私 璽	159
第五章 晉系古璽	185
第一節 官 璽	186
第二節 私 璽	205
第六章 秦系印章	323
第一節 官 印	325
第二節 私 印	369
結 語	399
引用印譜簡稱對照	402
參考文獻	405
英文提要	417
日文提要	419
後 記	421



第一節 戰國璽印研究概述

戰國璽印一般是指先秦時期的印章，其內容包括官璽、私璽、吉語格言璽和圖像璽等；從地區上來說，包括東方六國的古璽和秦印。戰國璽印是古代人們進行社會交往時用以昭明信用的憑證，也是國家機關行使權力的象徵和工具。關於古璽印的起源，學術界的分歧比較大，最具有代表性的意見有兩種：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璽印起源於春秋時期。這種結論是根據《左傳》、《國語》等典籍中的有關記載所得出的。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璽印起源於商代。這種結論是根據黃濬的《鄴中片羽》和于省吾的《雙劍謠古器物圖錄》所著錄的，相傳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安陽殷墟出土的三件類似璽印的器物所作出的推論。近年來，隨著一些新考古材料的出現加大了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現在有比較多的學者日趨認同三方商代古璽的可靠性。^[1]也有學者把上述三方銅印上的文字解釋為宗教符號，並進一步推論璽印起源於宗教。^[2]學術界對該三方璽印的性質和用途的看法雖然不同，但就時代而言，古璽印起源於

[1] 曹錦炎：《古代璽印》，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6頁。

[2] 潘振中：《試論我國印章起源於宗教》，《中國文物報》1988年7月22日。



商代的說法大體是可信的，但這個時期的璽印還不具備信物的功能。流傳到今天的古璽印基本上都是戰國時期的遺物，其中也有少量的春秋璽。

春秋時期諸侯國林立，各國任命官吏以及頻繁的政治活動和個人交往越來越離不開信物，而璽印正可作為國家行使權力和個人昭明信用的憑證。《說文·土部》云：“璽，王者印也。所以主土，從土，爾声。璽，籀文從玉。”《國語·魯語》云：“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卣，使季治逆，追而予之璽書。”韋昭注曰：“璽，印也。”這是春秋時期列國有關用璽以昭明信用的準確記載。戰國時期，列國之間雖然戰爭不斷，但社會發展的步伐並沒有因此而停止。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社會交往和商業活動等也日益頻繁，璽印在社會生活中的使用越來越廣泛，從而使之成為國家任命官吏、對外交往或政府在貿易活動中貨物通行、徵收賦稅的憑證；以及個人進行社會活動時，用以昭明信用的信物。正如《周禮·地官·司市》云：“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古璽印是春秋戰國時期政治、社會劇烈變革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它成為記錄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發展和興衰的重要載體。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璽印才成為當權者用以表徵權益的法物。^[1]

到宋代，隨著金石學的興起，不少人開始對古璽印加以蒐集和著錄，但蒐集者重在收藏和著錄，並沒有對古璽印進行系統的研究。其實，古璽文字內容豐富，它包含了大量的人名、地名、官名、成語等，為古代官制、地理沿革以及古代姓氏的發展等方面的研究可以提供大量可靠的材料。古璽文字不但可以證史，而且能夠補佚，所以，古璽印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但同古文字其它領域的研究相比，學術界對古璽印的研究相對滯後，真正對古璽印進行時代、文字、形制以及國別的研究是從晚清開始的。

一、古璽印名稱的確定與相關的著錄印譜

古璽文字是戰國文字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古文字研究領域的重要內容之一，其材料豐富，價值較高，在戰國文字乃至整個古文字領域

[1] 羅福頤、王人聰：《印章概述》，三聯書店，1963年，第3頁。



的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對戰國古璽進行著錄從宋代就已經開始，如王俅的《嘯堂集古錄》，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這一時期雖然已有古璽著錄，但對其進行的考釋工作很粗疏，著錄體例亦不完善。真正對古璽進行比較系統的著錄是從元代開始的，如元代趙孟頫的《印史》，楊遵有《印譜》四冊等。明代以來，很多收藏家將古璽刊行於世，如隆慶五年（1571）顧從德的《集古印譜》所收錄的古璽有幾十方。到清代早期，人們對古璽印的認識雖較前代為深，但學者大多仍無法分辨出古璽印的時代，往往將其作為附錄，或者乾脆不予收錄。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吳觀均的《稽古齋印譜》，乾隆三年（1738）程從龍的《師意齋印譜》等。這一時期學者們對古璽印的認識還很混亂，分不清楚哪些是先秦古璽，哪些是秦印或漢印，更談不上區分官璽、私璽等，所以，這一時期古璽印的研究工作還處在很不成熟的階段。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瑤田的《看篆樓印譜序》開始認出古璽中的“私璽”二字。道光八年（1828），徐同柏為張廷濟編的《清儀閣古印偶存》，首次列出“古文印”類目，正式區分出古璽。

近代以來，各種有關古璽印的專書不斷出現，所收錄的古璽印數量都十分可觀，對所收璽印的分類開始越來越準確，研究水準也越來越高。如同治元年（1862）吳式芬的《雙虞壺齋印存》正式標出“古璽”類目，又分出“古璽官印”、“古朱文印”等項，並將其排列在秦印和漢印之前。同治十一年（1872）陳介祺的《十鐘山房印舉》也首次把“古璽”單列出來，並認識到朱文銅璽似六國文字，玉印似六國書法，實屬難能可貴。^[1]王國維則首先肯定了古璽文字為六國文字，他在《桐鄉徐氏印譜序》（1925）中認定古璽文字為“六國古文”。羅振玉的《赫連泉館古印存序》（1915）中指出古璽中有“成語印”。這些都是近代以來學者們對古璽著錄以及區分古璽內涵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時，戰國時期除了華夏族的璽印之外，在中國西南地區，還出現了巴蜀族的璽印。這些璽印的印面並非文字而是由一些人物、工具、兵器等圖形的組合，一般稱之為巴蜀符號。

[1] 曹錦炎：《古代璽印》，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6頁。



新中國建立以來，戰國古璽除了傳世品以外，從地下也有零星出土發現，一般均由不同學術刊物隨即發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新出版的古璽著錄著作有：《上海博物館藏印選》（1981）、《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1980）、《故宮博物院藏古璽印選》（1982）、《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1987）、《湖南省博物館藏印選》（1991）等。王人聰的《新出歷代璽印集錄》（1983）比較集中地收錄了新中國建立後出土的古璽印。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彙編》，該書收錄古璽達五千七百多方，是古璽著錄的集大成者。該書將所收古璽分為官璽、姓名私璽、複姓私璽、成語璽、單字璽、補遺等六部分，為古璽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1989—1994年，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印行康殷等主編的《印典》，該書雖然存在很多可商榷之處，但其中也收錄了一些珍貴的印章，是研究古璽印不容忽視的參考著作。九十年代以來，又有不少有關戰國古璽印的著錄著作陸續問世，如魏廣君的《古印精粹》（1994）、天津藝術博物館編的《天津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1997）、莊新興的《古璽印精品集成》（1998）和《戰國璽印分域編》（2001）、徐敦德的《西泠印社古銅印選》（1999）、來一石的《古印集萃（戰國卷）》（2000）、《（明）顧氏集古印譜》（2000）、蕭春源的《珍秦齋古印展》（1993）和《珍秦齋藏印（戰國篇）》（2001）、韓天衡、孫慰祖的《古玉印集存》（2002）等等，這些印譜都是我們系統研究戰國古璽的寶貴參考資料。

二、關於古璽印的理論研究

關於古璽印的理論研究起步較晚。1963年，三聯書店出版了羅福頤、王人聰合著的《印章概述》。全書分為十四章，分別對歷代璽印的書體名稱、鈕制、材質、類別、時代等進行了闡述，其中不乏獨到見解。在此基礎上，先後有不少學術論著問世。如林素清的《先秦古璽文字研究》^[1]，馬國權的《古璽文字初探》^[2]等。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羅

[1] 林素清：《先秦古璽文字研究》，臺灣大學碩士論文，1976年。

[2] 馬國權：《古璽文字初探》，1980年中國古文字學會第三屆年會論文。



福頤的《古璽印概論》，這是一部關於古璽方面的通論性著作，內容包括古璽印的書體名稱、歷代璽印的紐制、傳世古璽的由來和類別、古璽的時代考證以及古璽、封泥的辨偽等等，為初學古璽者必讀之書。1981年羅福頤發表了《近百年來古璽文字之認識和發展》一文^[1]，對近百年來古璽文字研究的成果進行了歸納和總結。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李學勤的《東周與秦代文明》，該書專列一章璽印的內容，從理論上比較簡潔地介紹了古璽印的一些問題。1985年，齊魯書社出版了王獻唐的遺著《五鐙精舍印話》，該書涉及到古印譜、印章形制、印文考釋、璽印鑒賞等有關古璽印的知識，對研究印學源流、璽印出土、流傳情況，以及研究古璽文字、探討古代典章制度等有重要的參考價值。1996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了曹錦炎的《古璽通論》、《古代璽印》，這兩部書對古璽的時代、古璽的認識和研究、古璽的形制、分類以及構形特點等進行了比較全面的闡述。2002年，肖毅完成其博士論文《古璽文字研究》，從文字形體、語辭等方面入手對古璽中的職官、姓氏、成語等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文字考釋與分域整理。1997年和2003年，文物出版社與紫禁城出版社分別出版了葉其峰的《古璽印通論》和《古璽印與古璽印鑒定》，這兩部書從理論上對古璽的形制與篆刻、官璽、私璽、成語璽以及肖形璽等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以上這些關於古璽理論的專著，都是研究古璽印的重要參考書。最近幾年也有不少站在藝術的角度談論古璽的著作，茲不贅述。

三、關於古璽印的文字考釋及分域研究

前文已經談及，同古文字其它領域的研究相比，有關古璽文字的研究起步較晚。對古璽文字的考證研究始於清代末年。光緒九年（1883），吳大澂編纂的《說文古籀補》刊行於世，該書收錄了古璽文字五百七十多個，代表了當時古璽文字研究的水平，為後人研究古璽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丁佛言編纂的《說文古籀補補》（1925）和強運開編纂的《說

[1] 羅福頤：《近百年來古璽文字之認識和發展》，《古文字研究》第5輯，中華書局，1981年，第243頁。



文古籀三補》(1935)都是在吳書的基礎上編訂而成的，對古璽文字的考釋均有涉獵。羅福頤的《古璽文字徵》(1930)是第一部專門輯錄古璽文字的著作，標誌著古璽研究進入成熟期。但此後，學術界對古璽印的研究進展比較緩慢。直到新中國建立以後，學術界對古璽印的研究才重新熱烈起來。1958年，吳樸堂整理的黃賓虹遺著《賓虹草堂璽印釋文》在上海出版，這是第一部以考釋古璽文字為主的專著。該書對許多古璽文字的釋讀精審準確，對古文字學界研究古璽文字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此後，關於古璽文字的考釋論文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其中也涉及到對古璽的分域問題。如朱德熙、裘錫圭的《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解決了一些古璽中的疑難字。1973年兩位先生又發表了《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第12期）一文，系統論證了戰國時期以“自”為“官”，考釋出古璽中的“官”字以及從“官”的字。1978年史樹清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從“夏虛都”三璽談夏朝的都城》，考證了“夏屋都左司馬”、“夏屋都丞”以及“夏屋都司徒”三方璽，引起學術界廣泛的討論。同年，朱德熙在中國古文字第一屆年會上提交《戰國陶文和璽印文字中的“者”字》一文，考釋出古璽中的“者”和“都”字，對古璽文字的考釋有不少創見。1979年葉其峯在《故宮博物院院刊》發表《考釋幾方工官印》，介紹了一些罕見的古代官印。1979年和1980年石志廉在《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分別發表《館藏戰國七璽考》和《戰國古璽考釋十種》，均介紹和考證了一些官璽，對釋文也提出了一些寶貴的見解。1979年在第二屆古文字年會上，于豪亮提交了《古璽考釋》一文，對“長平君相室璽”等四方古璽進行了考證；羅福頤提交了《近百年來古璽文字之認識和發展》一文，對近百年來古璽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的回顧和總結。1980年黃盛璋在《河南文博通訊》發表《所謂“夏虛都”三璽與夏都問題》的商榷文章，提出這類官璽屬於燕國印等觀點，在學術界引起強烈的反響。1980年裘錫圭的《戰國文字中的“市”》（《考古學報》1980年第3期）一文發表，該文結合其它古文字材料，考釋出古璽中不同地區之間“市”字的結構特點，實屬古文字考釋的典範之作。1980年馬國權在



第三屆古文字年會上提交了《古璽文字初探》一文，對古璽文字的源流、特點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的總結。

八十年代以來，有關古璽文字考釋方面的文章層出不窮，如：李家浩的《戰國時代的“豕”字》（《語言學論叢》1981年第7期），考釋出古璽中的“豕”字。曹錦炎的《釋率》（《史學集刊》1983年第3期），考釋出古璽中的“犢”字以及從犢聲的一系列字。裘錫圭的《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古文字研究》1983年第10輯），考釋出古璽中的“脂”、“脂”等字以及從這些字或偏旁的一系列字，發明創見很多。這方面的論文還有：羅福頤的《對古印章的認識》（《西泠印叢》1981年第3期）；陳漢平的《釋古璽文“堂”字》（《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2期）；王人聰的《古璽考釋》（《古文字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1983年）；曹錦炎的《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4期）；何琳儀的《古璽雜識》（《遼海文物學刊》1986年第2期）；王輝的《古璽釋文二則》（《人文雜誌》1986年第2期）；陳漢平的《古文字釋叢》（《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2期）；徐寶貴的《戰國古璽文字考釋五則》（《松遼學刊》1988年第2期）；石志廉的《戰國古璽文字考釋十一種》（《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9年第13、14期）；裘錫圭的《淺談璽印文字的研究》（《中國文物報》1989年1月20日）；吳振武的《古璽合文考（十八篇）》（《古文字研究》1989年第17輯）；劉釗的《璽印文字釋叢（一）》（《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2期）和《璽印文字釋叢（二）》（《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3期）；李家浩的《戰國官印考釋（二篇）》（《文物研究》第7期，黃山書社，1991年）；李學勤的《中國璽印的起源》（《中國文物報》1992年7月26日）；施謝捷的《古璽印考釋五篇》（《印林》1995年第16卷第2期）和《古璽文字考釋五篇》（《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以及《古璽印考釋十篇》（《印林》1996年第17卷第2期）；徐在國的《古璽文字八釋》（《吉林大學古籍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和《“信士”璽跋》（《古漢語研究》1998年第4期）及《戰國官璽考釋三則》（《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3期）；白於藍的《古璽文字考釋（四



篇》)(《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3期);吳良寶的《璽陶文字零釋(三則)》)(《中國古文字研究》第1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魏宜輝、申憲的《古璽文字考釋(十則)》)(《東南文化》1999年第3期);譚宏皎的《中國古璽文字考釋兩篇》)(《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4期);劉信芳的《古璽釋解十則》)(《中國文字》2000年第26輯)等等。以上這些文章,雖然都是以考釋古璽文字為主,但也間或談及古璽印的分域問題,都是對戰國古璽進行分域集釋的重要參考資料。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古璽文字考釋方面的論文對古璽分域研究也有涉獵,如:尤仁德的《春秋戰國八璽考釋》)(《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3期);朱德熙的《古文字考釋四篇》)(《古文字研究》1983年第8輯);吳振武的《戰國“廩”字考察》)(《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4期)和《戰國璽印中“虞”和“衡鹿”》)(《江漢考古》1991年第3期)及《戰國璽印中的“申屠”氏》)(《文史》1992年第35輯)和《陽文秦印輯錄》)(《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2000年);陳漢平的《古文字叢釋》)(《出土文獻研究》,1985年);湯余惠的《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1986年第15輯);王輝的《秦印探述》)(《文博》1990年第5期)及《秦印考釋五則》)(《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2000年);王人聰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官印略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3期);韓自強的《安徽阜陽博物館藏印選介》)(《文物》1988年第2期);徐寶貴的《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中國文字》1991年第15期)和《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七篇》)(《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3期);施謝捷的《“印”之別輯》)(《西泠印叢》1989年第4期)等近十篇論文;裘錫圭的《淺談璽印文字的研究》)(《中國文物報》1989年1月20日)和《“諸侯之旅”等印考釋》)(《文物研究》1990年第6期)等;何琳儀的《古璽雜識續》)(《古文字研究》1992年第19輯)和《古璽雜識再續》)(《中國文字》新十七期〈董作賓先生百歲誕辰紀念特刊〉,藝文印書館,1993年)及《戰國官璽雜釋》)(《印林》1995年第16卷第2期);劉釗的《釋戰國“右騎將”璽》)(《史學集刊》1994年第3期)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藏印續集一》讀後記》(《中國篆刻》1997年第4期)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釋文訂補》(《中國文字》1998年第24期);李家浩的《戰國官印考釋兩篇》(《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王人聰的《戰國官印考釋兩篇》(《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劉樂賢的《古璽漢印複姓合證三則》(《中國古文字研究》第1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董珊的《新見戰國古璽印一一七方》(《中國古文字研究》第1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葉其峯的《戰國官署璽》(《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2000年)等等。還有一些其它領域的文字考釋文章對古璽研究也有所涉獵,茲不一一列舉。

真正從理論上和文字考釋方面最早對古璽印進行分域研究的當屬李學勤。1959年《文物》第7~9期連載了李先生的《戰國題銘概述》一文,該文對傳世的重要古璽第一次按地域介紹了其特點,從而揭開了古璽印分域研究的序幕。此後,很多學者開始站在分域的角度對古璽進行文字的考釋和研究。如:石志廉的《戰國古璽考釋十種》(《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0年第2期);葉其峯的《戰國官璽的國別及有關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趙超的《試談幾方秦代的田字格印及有關問題》(《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6期);李學勤的《楚國夫人與戰國時代的江陵》(《江漢論壇》1982年第7期);黃盛璋的《“匈奴相邦”印之國別、年代及相關問題》(《文物》1983年第8期)和《戰國“江陵”璽與江陵之興起因沿考》(《江漢考古》1986年第1期);湯余惠的《楚璽兩考》(《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李家浩的《楚國官印考釋(四篇)》(《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朱德熙的《釋桁》(《古文字研究》1985年第12輯);鄭超的《楚國官璽考述》(《文物研究》1986年第2期);胡仁宜的《“大莫囂”古官璽》(《文物》1988年第2期);牛濟普的《秦印瑣記》(《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蕭高洪的《秦印的特點及其形成的文化背景》(《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王輝的《秦印探述》(《文博》1990年第5期);葛英會的《戰國齊“徒氓”與“爰土易居”》(《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1年第



15~16期);劉釗的《楚璽考釋(六篇)》(《江漢考古》1991年第1期);牛濟普的《楚系官璽舉例》(《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邵磊的《秦代印章初探》(《印學論壇》1993)和《戰國古璽分域叢談》(《南方文物》1996年第4期);董珊的《古璽中的燕都薊及其初封問題》(《江漢考古》1993年第4期)和《秦郝氏箴言款考釋》(《中國篆刻》1997年第4期);曹錦炎的《釋楚國的幾方烙印》(《江漢考古》1994年第2期)和《上相邦璽考》(《中國文物報》1995年12月17日);羅運環的《論楚璽及其它》(《江漢考古》1994年第4期);王人聰的《考古發現所見秦私印述略》(《南方文物》1994年第4期);吳振武的《古璽和秦簡中的“穆”字》(《文史》1994年第38輯);任隆的《試論秦官印及其藝術特色》(《文博》1996年第6期);何琳儀的《燕璽簡述》(《北京文博》1996年第3期);王人聰的《秦鄉印考》(《中國文物報》1996年2月4日);施謝捷的《釋戰國楚璽中的“登徒”複姓》(《文物資料》1997年第4期);韓自強、韓朝的《安徽阜陽出土的楚國官璽》(《古文字研究》2000年第22輯);吳榮曾的《對幾方秦漢印章的考述》(《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2000年);陳松長的《湖南省博物館藏出土璽印分期淺論》(《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2000年)等幾十篇學術論文,都對古璽的分域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同時,也有一些專著涉及到古璽印的分域問題,如羅福頤的《古璽印概論》(文物出版社,1981年);李學勤的《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陳世輝、湯余惠的《古文字學概要》(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何琳儀的《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1989年)和《戰國文字通論(訂補)》(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曹錦炎的《古璽通論》(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年);葉其峯的《古璽印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等十幾部。

以上所列的論著,只是有關古璽印研究眾多成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它們都是學者們對某一方璽或某幾方璽的考釋或分域研究的成果,有的對戰國古璽的分域研究從理論上進行了介紹,有的從文字的構



成特點入手對分域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均有獨到之處，為戰國古璽的系統研究可以提供很大的幫助。

戰國時期在諸侯紛爭的舞臺上除了所謂的戰國七雄以外，還有不少弱小國家加入其中，有些國家的官制和風俗習慣以及所使用的文字風格等很相近，而且不同國家的官制和風俗文化往往交織在一起，這為戰國文字的分域研究帶來了一定的難度。近百年以來，學術界最早對戰國文字進行分域研究的應該首推王國維，他首先將戰國文字分為東土、西土兩大區域。他在《史籀篇疏證·序》中云：“《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至許書所出古文者，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1]其後，唐蘭把戰國時期的秦文字與春秋時期的秦文字以及秦代的小篆總稱為秦系文字，而把東方各國的文字稱為六國文字。^[2]新中國建立以後，許多學者對戰國文字的分域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學勤的《戰國題銘概述》將戰國文字分為兩周題銘、齊國題銘、燕國題銘、三晉題銘、楚國題銘和秦國題銘六個部分^[3]，對戰國文字的分域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何琳儀的《戰國文字通論》採用《戰國題銘概述》的分法，但並不以國家分類，而以地區分類，即以“系”分類。一系之內既可以是一個國家的文字，如“燕系文字”、“秦系文字”，也可以包括若干國家的文字，如“齊系文字”、“晉系文字”、“楚系文字”等。^[4]曹錦炎則將上述分法結合在一起。他認為戰國文字從總的方面來說，當時的文字體系大致可以分為東土、西土兩大區域，五個系；也就是先分區域，後分系。^[5]在對戰國古璽進行分域研究時，本文將採用何先生的劃分方法，也就是不依國家分類，而是根據地區進行分類，把戰國古璽按照五個大系對官璽、私璽等分別進行分域歸類和解釋。

[1] 王國維：《王國維遺書》卷六，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

[2]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齊魯書社，1981年，第315頁。

[3]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文物》1959年第7、8、9期。

[4]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1989年，第78頁。

[5] 曹錦炎：《古璽通論》，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年，第75頁。